

---

# 中国经济的新观点

中兼和津次

(NAKAGANE Katsuji, 青山学院大学)

谢谢介绍。我是青山学院大学的中兼。能有机会对 Chow 老师的发言作一些评述，我感到非常荣幸。接触过经济学，特别是计量经济学的人，都知道 Chow 老师的名字。他是世界著名的学者。特别是 Chow 氏验证法，是非常有名的统计验证方法。Chow 老师以非常广阔的 aspect，或者说是视野，对中国经济，怎么说呢，分析了其内在的构造，并对其将来作了展望。我所特别感兴趣的是，经济学的理论，究竟能够在何种程度上解释中国的现状。在这里，我想主要从这方面陈述一些我的观点。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实现了非常快速的成长，将来也许会形成很大的市场规模。因此受到了国际上的普遍强烈关心。同时就有很多关于中国发展的构造究竟是怎样的，或者中国的经济体制究竟有什么特点等等的讨论。这里就有一些争论，围绕着传统的框架或者模型究竟是否能够充分有力地说明中国的经济成长这个问题。

有关这些内容，下面我想谈四个问题，是 Chow 老师没有谈到的，也是我个人所关心的问题。因为时间关系，最后的第四个问题可能会省略。第一个问题，是被称为过剩劳动力论的问题。即认为中国的农村中历来存在着大量的过剩劳动力，将过剩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即可实现经济成长，实际上也正是这样做成功地带动了经济成长。这种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赞同。但是最近，有很多人开始反对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农村的过剩劳动力并非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我们原来以为毛泽东时代就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看来并非是这样。还有人认为，中国的剩余劳动力是随着 90 年代的市场化开始出现的。诸如此类，关于剩余劳动力问题出现了种种的争论，对以往的解释提出了质疑。普遍认为，中国是依靠提供大量的低成本劳动而发展的。可是，北京大学著名的经济学家，Justin Lin 教授，也就是林毅夫教授认为，中国在毛泽东时期就应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不应该发展钢铁工业这样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也就是说，当时优先发展重工业是错误的。而今天中国之所以能够发展，则是因为根据比较优势发展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当然，这种观点是否正确仍然需要考虑。

第二个问题就是 Chow 老师的发言中也提到的，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我们知道，IMF 以及世界银行主张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应该伴随着财产权的改革，市场化的同时应该伴随着财产权的改革，也就是必须实行私有化。事实上前苏联和东欧也的确实行了这样的改革。而中国的做法有所不同，中国虽未首先实行这样的财产权改革，却成功地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正如 Chow 老师也曾指出的，中国从小规模企业到大规模企业逐步推行了国有企业的重组。另一方面 Chow 老师也在他的《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这本书中指出，决定企业经营者行动模式的并非所有制，问题在于如何使经营者产生努力工作的动机。这是以往

学术界的普遍认识，但是另一方面，今天在中国看到的民营化及私有化的大潮，似乎又对这种认识是否合理提出了质疑。川井老师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就是国有企业改革是否最终还是需要进行民营化。有关这一问题的探讨已经日渐增多。我的看法是，中国至今为止实行的是事实上的私有化和民营化，而现在，可以认为，中国已经在逐步实行法律上的，即合法的，依法的民营化。因此，提高企业效益及形象等问题也开始被重视。

第三个问题就是俗称为雁行形态论的问题。以往认为，中国也会继日本，NICS，或 ASEAN 之后推行赶超型的工业化政策。刚才 Chow 老师的发言中也讲到，就是有关强调后发优势的讨论，即后来者可以低成本地使用先行者的技术，从而可以加快赶超先行者的速度。我同意这种后发的优势及雁行形态论不失为一种理论根据。但是，中国现在快速提高技术吸收能力，可以生产从尖端的技术密集型到极为传统的、典型的劳动密集型的很广范围内的产品，并且一部分尖端技术产品已开始出口。我认为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下这种状况为什么成为可能。刚才，Chow 老师说，FDI 即外国直接投资并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性原因。但是我认为不谈 FDI 外国直接投资就无法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外国投资涌入中国，从而带来的资本、经营技术以及一般技术的技术移转交换，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当然这并非是唯一原因，如果是唯一原因的话，马来西亚和其他国家也会有同样发展。我认为中国有着不同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很大的特殊性。那是什么呢？就是毛泽东时代所积累下来的产业技术。刚才我对 Justin Lin 教授的观点提出了一些质疑。我觉得毛泽东时代所推行的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似乎今天仍在沿用。还有中国现存的极端的地域差距（这个问题 Lu Ding 老师也指出了）的状况是否也可以说是中国赶超速度快的原因之一呢。比如说，沿海地区的上海，广东等地区的有些地方的发展水平已接近 NICS，大部分地方已与 ASEAN 持平。这些地区已在使用非常尖端的技术，可是内陆地区的落后地方还尚在生产技术含量很低的東西。由此可见生产处于一种地域分布不均的状态。

第四个问题想谈一谈开发独裁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上午已经讨论过了，在这里无需多言。而且我也不是专家，不太想过多涉及。只是我认为中国今后有必要进一步探讨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这两方面该怎样相互协调的问题。Chow 老师在他的论文中提到，加入 WTO 要求中国在加强法制制度的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最终归结到有关这些方面的状况将会怎样发展。在探讨有关以上几个争论的焦点问题时，就象 Chow 老师再三强调的，有必要在尊重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的同时，也需要有新的看待问题的方法和具备灵活机动的理论框架。比如说在这本书里，Chow 老师展示了国有企业的两种模型：A 模型和 B 模型。A 模型是旧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型；B 模型最初是经济改革初期的模型。观察这两个模型，其目的关数不同，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想法。它尝试了从经济学的企业理论来说明制度的变化是怎样影响企业行为的。Chow 老师也提到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政治背景，各种制度上都显示出中国的特殊性，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经济学分析时，巧妙地将制度的特殊性融入其中。但是，Chow 老师的模型中，企业行为被设想成了最大化，可是这也还是没有结合实际的制度问题，也就是有企业并非总是谋求最大化。象这样的制度问题在很多方面都存在。我们有必要在建立新的中国经济研究模式的时候考虑到这些问题。

Chow 老师指出影响今后中国经济发展有三个因素：第一是高素质的人口、劳动力，第二是虽不完全健全，但能够很好或较好地发挥机能的市场制度，第三是刚才讲到的后发优势。他刚才也提到，日本以及 ASEAN、NICS，也都是利用这种优势发展起来的。从这种意义来讲，这三个因素决非是中国特有的。那么中国特有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呢？论文中没有提到，刚才的发言里稍有涉及，他们似乎想说是儒教。十几年以前，日本也曾流行过儒教经济论，就是将东南亚发展的原因归结为儒教。可是这种论调不到一年就结束了。因为儒教并不是主要原因。过了一些时候泰国经济发展了，于是又有了关于佛教的讨论。可见，虽不能断言宗教性的东西绝对没有关系，但似乎可以说它并不是主要因素。我所考虑的中国特有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规模，是可用人口来衡量的规模。以往认为，规模大、人口多是不利条件，所以中国一直在控制人口。但是，今天的中国不正显现了规模大所持有的优越性吗？比如说，为什么外资大量涌入中国呢？当然是为了寻求优质的劳动力。这也是一个原因，但与此同时，人们认为中国市场会越来越大，外资涌入也是为了寻求这个市场。如果中国的人口是5000万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外资涌入。我认为在分析经济发展结构时，我们需要考虑怎样把规模的因素也融入其中。比如说，理工科的大学毕业生，中国大概是日本的将近10倍，7，8倍以上。这个数量意味着巨大的力量。这是泰国没有的，马来西亚没有的，印度尼西亚当然也没有。这是中国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何将此融入到我们的分析当中非常重要。请允许我讲一个个人的经历，十几年前在一次研究学会的大会上，我做了有关中国经济现状的报告。那时有一位老师，是一位计量经济史的专家，他问我怎样考虑中国经济的规模，也就是 size。当时我没能回答出来。到今天我想我其实应该象刚才那样回答。据我所了解的，包括 Chow 老师在他的《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中，好像都没有强调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后应该将此作为一个重要的题目来思考。时间到了，我的发言到此结束。

(俞嵘 译)